

# 話本小說概論

胡士莹著

中華書局

# 話本小說概論

(下 册)

胡士莹著

中 华 书 局

1980年·北京

## 第十一章 明代的说书和话本

### 第一节 明代社会对说书和话本的影响

元末农民大起义结束了元朝的残酷统治，也削弱了汉族地主的势力；在朱元璋等农民起义军占领的大江南北，曾建立过根据地，虽还保存地主经济，但自耕农的力量壮大了，这曾是朱元璋得以统一全国的基础。这些都使我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有利于农民的改变。在手工业方面，元代严酷的工奴制被冲垮了，独立的手工业者增加了；同时，也为明代的官办手工业工人争取到了比元代较为自由的身份。这样，手工业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有利于劳动者的改变。以上的改变，为明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根本的条件。朱元璋夺取农民大起义的果实以后，政权性质完全变为地主阶级专政，但由于农民大起义的深刻影响，也由于当时生产力破坏的情况足以危及他的统治，乃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控制豪强兼并、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政策，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明代前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农村和城市的经济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繁荣。但同时，豪强兼并，首先是皇族统治集团和大官僚的兼并，逐渐地变本加厉，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使农业生产受到摧残，官办手工业和官卖、海禁政策也压抑着工商业的发展，明代生产力的发展总的说来是缓慢的。然而，长期以来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劳动的积累，使社会生产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棉花、蚕桑、麻、漆、果、酒、竹、油料、染料、木材、药材等等产品的大量生产和商品化（粮食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商品），使农业生产从单一经济

逐渐走向多种经营的经济，并参加了全国范围的商品流通。一部分经营地主和富农采取了雇工剥削的方式，契约制和货币关系出现了。在手工业方面，农家副业开始商品化；一部分手工业者从农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进而又分化为手工业者工场主和手工业工人；而官办手工业也逐渐由工役制变为雇佣制；织染、陶瓷、矿冶、造纸、印刷以及各种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生产大为发展。

明张瀚的《松窗梦语》里就有这样一段记载：

縠庵祖家道中微，以酤酒为业。成化（1465—1487）末年，值水灾……因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诸色绉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

正说明代中叶由于国内市场和外贸的发展，纺织业某些部门的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很快。

一方面，手工业确实已经从农业中大量分离出来，大批工商业城镇在这时期产生，就是明证。某些商品原料产地和加工基地已经分开（如丝、棉），而互相依存。各种不同的生产单位之间的社会分工已相当精细，行业的数量达到三百六十行<sup>①</sup>。商品种类繁多，流通广泛，一个全国性的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在江南等地区，独立的手工业者和手工业工场大量出现，新兴的手工业市镇也如雨后春笋。同时，国外贸易，除了明王朝官府控制下直接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朝贡”和“边市”外，私商的外贸也以“走私”和“小市”等方式进行，并促进了国内的商品生产。

另一方面，在一部分手工业工场和作坊中，雇佣关系也大量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有了“计日受值”的手工业工人，也有了从店中“给筹取值”的劳动者。长工在工场作坊内还有半家长制

<sup>①</sup> 见《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委巷丛谈》。

关系的制约，但某些人也已有选择雇主的自由<sup>①</sup>，短工、日工则是临时受雇，完全是货币关系。而在苏州等地，这种生产关系下的手工业工人很多，仅苏州一府织工染工各达数千人，这样就使明代的大小城市及手工业市镇空前繁荣，使市民阶层空前壮大。

但当时封建王朝越来越苛重的税赋徭役，专卖制度、海禁政策以及大量的土地、物料、贵金属的霸占；封建官僚地主对工商业的侵占和剥削以及对广大农民的压榨和束缚；封建的工役制、行会制、家长制以及封建意识对独立工商业者的限制；等等，都使生产力受到摧残。加上大商人、大工矿主、经营地主的剥削也很残酷，广大工农业劳动者，特别是手工业工人、贫雇农、僮奴等经常处于啼饥号寒，“岌岌乎无生路”的境地。

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而当时的市民阶层中的广大劳动者不但在经济上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政治上也开始成为一支反对压迫、剥削的社会力量。他们的经济要求常常带有政治改良的性质，如改革赋役，改革工役制，废除海禁，反税使矿监等等。

其中苏州府的织工暴动，以有纪律讲政策的织染工人为主体，还出现了象葛贤那样有坚决斗争精神和组织能力的、有朴素的政策纪律观念的人物，象遍及全国主要工商业地区的反矿监税使的斗争，杀税官，烧官府，斗争勇猛，声势浩大。在许多斗争中，广大市民对待官吏总是以其对市民利益的态度为准绳来决定取舍。如松江市民挽留李知府的斗争，是因为李不但能不受贿赂，“昭雪民冤”，而且对“匠役铺户，必计工给值，绝无留滞”；如杭州市民反对封建苛役的斗争，也因为教读丁士卿主张免除市民充当夜巡夫役的负担，有利于生业，而援救丁士卿，烧毁仗势免役的豪家巨室，直

---

<sup>①</sup> 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78页至第80页。

逼官府<sup>①</sup>。这许多斗争，虽因当时的市民力量还小，还没有完全形成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更没有任何推翻封建政权的要求，没有明确的反封建意识，但斗争的矛头，总是直指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其中，反对恶霸官僚地主徐阶、董伯念、范应期等人的斗争，都是以反对霸占土地，反对重利盘剥，要求退赔地价等为内容，形成了农民、市民联合斗争的新局面。而“民抄董其昌”的斗争，更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士兵为主体的斗争。这些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明王朝对于其在江南等重点搜括地区的统治。

当然，在反封建斗争中，主力军总是农民阶级，而明代的下层市民，特别是工矿手工业工人，每当农民起义的时候，常踊跃参加，壮大其队伍，扩大其影响。福建沙县佃农邓茂七起义，处州矿工叶宗留，尤溪炉主蒋福成也参加了，声势更大。李自成的起义队伍，沿途得到矿工的响应，主将刘宗敏就是锻工出身。<sup>②</sup>

明代城市平民的斗争如此激烈和普遍，在我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市民阶层逐渐壮大、逐渐觉醒的直接结果。斗争本身，又锻炼了市民。

在上述的市民斗争中，城市的中产阶级(工矿主、商人)往往参加，表现出市民阶层中不同等级共同斗争的特点。一部分和工商业有联系的士子(封建知识分子)，一部分和封建当权派有矛盾的地主、失势官僚，也往往采取同情、利用的态度。这些人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在要求自由地发展工矿业和商业，反对皇族与当权大官僚的专制特权方面，却是一致的。

作为这些社会矛盾的反映，明代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充满着矛盾斗争。这斗争体现在哲学、政治、伦理、美学等许多方面。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左派王学”反映了人民

① 见前书第 114 页至 115 页。

② 见前书第 92 页。

(实质上以工商业者为主)要求民主、要求平等、要求自由的愿望。他们反对封建主义的道,他们怀疑儒教,反对理学,主张“童心”、“真性”。这种思想,在当时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在美学方面则反对复古主义,反对形式主义,推崇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他们和封建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对明代的学术思想、文艺思想有巨大的影响。

这样的社会,当然对说书和话本有重大的影响。

封建统治阶级对小说、戏曲等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采取压抑、摧残、利用、篡夺的政策,迫使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成为封建主义的装饰品、麻醉剂。

明代的统治者,是熟悉和懂得小说等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作用的。一方面,他们借口“诲淫”、“诲盗”,厉行禁令,企图扼杀一切有“犯上作乱”倾向的文艺。永乐年间的所谓“国初榜文<sup>①</sup>”就说:

……但有褒褒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圣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乾淨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

这虽是针对戏曲颁布的法令,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小说也不例外。请看当时瞿佑的《剪灯新话》,有人请予禁毁<sup>②</sup>,而李祯为了著《剪灯余话》,甚至不得列于乡贤祠<sup>③</sup>。文人尚且如此,现实性、斗争性强烈的民间文艺,自更不必说了。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重厚”条注说:

钱氏曰: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

①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

②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二子部小说类注:“瞿佑又有《剪灯新话》,正统七年癸酉李时勉请禁毁其书,故与李祯《余话》皆不录。”

③ 此事明叶盛《水东日记》卷十四,陆容《菽园杂记》卷十,都穆《听雨纪谈》均有记载。

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

从这一段话里，我们不难理解封建卫道者们对于小说是何等的深恶痛绝。

统治阶级对于民间艺人，向来就是贱视的、残酷无情的。清焦循《剧说》卷一说：

《国初事迹》云：洪武时令乐人张良才说评话，良才因做场擅写省委教坊司招子，贴市门柱上。有近侍言之，太祖曰：“贱人小辈，不宜宠用。”令小先锋张焕缚投于水。

又明都穆《都公谈纂》卷上说：

陈君佐，扬州人，善滑稽，太祖爱之。尝令说一字笑话，请俟一日，上许之。君佐出寻瞽人善词话者十数人，诈传上命，明日，诸瞽毕集，背负琵琶。君佐引之见上，至金水桥，大喝曰“拜”。诸瞽仓皇下跪，多堕水者，上不觉大笑。

另一方面，他们又提倡宣扬封建思想、因果迷信，甚至色情猥亵的文艺，作为自己的娱乐，也作为对人民精神生活的腐蚀剂。明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云：

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

史言宪庙好听杂剧及散词，搜罗海内词本殆尽。

武宗亦好之，有进者即蒙厚赏，如杨循吉、徐霖、陈符所进，不止数千本。

可见他们对无妨于他们统治的小说戏曲，不但爱好，而且搜罗占有之心甚切，特别是宪宗、武宗，“搜罗海内词本殆尽”，“有进者即蒙厚赏”，而武宗且以重金购阅《金统残唐记》<sup>①</sup>。神宗处在农民起义

<sup>①</sup> 《金陵琐事剩录》卷一《金统残唐》：“武宗一日要《金统残唐》小说看，求之不得。一内侍以五十金买之以进览。”

尚未勃兴的时期,也好览《水浒传》<sup>①</sup>,宋高宗喜阅话本都可说明他们有同样的嗜好。统治阶级的这种倡导当然会对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发展起一定的作用,因而,当说书、话本、戏曲的编撰落入封建文人(他们也是统治阶级的成员)之手,宣传忠孝节义、宿命果报、猥亵淫秽等等的作品便泛滥起来了。明代虽也有民间的话本,但更多的是文人的拟话本,而拟话本作品中所以会有大量的糟粕,这是主要的原因。

越来越壮大的市民群众和更广大的农民群众,却是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真正爱好者和保卫者。明代文化普及的程度似较宋代为高,加以印刷技术的发展,市民之于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不仅是听众、观众,而且是读者。不论书贾、戏班、艺人、作者,从官府、贵族那里赚钱的机会毕竟有限,收入的主要来源还是在市民和农民中。因而,和宋元一样,明代的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也必然要反映市民以及农民的思想、感情、习惯和要求。

但是,明代的市民成分更加复杂(包括手工业工人、独立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船夫苦力游民,工场作坊主、商人,士兵,隶役,下级官吏,城市知识分子等等。),思想也很复杂。他们要求经营工商业的自由、要求劳动和人身的自由,对封建专制有所不满。此外在与统治阶级的斗争和职业的经营中,也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地位。这些,在当时的社会上,都是进步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然而,他们(除了手工业工人之外)又普遍地有发财致富的强烈愿望,为此还不惜投机取巧;追求享乐,玩弄妇女。另一方面,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又往往和封建统治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的复杂情况当然影响了说书和话本的面貌。也是明代话本和拟话本作品菁芜并存的重要原因之一。

---

<sup>①</sup> 明刘銮《五石瓠》卷六《水浒传》：“神宗好览《水浒传》。或曰，此天下‘盗贼’萌起之徵也。”

有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士大夫如汤显祖、冯梦龙等人，和皇族、豪强有矛盾，能够比一般市民更清醒地看到社会矛盾，并以文艺作为武器参加了斗争。他们热爱话本、民歌、戏曲等颂扬人民的美好品德的作品，但他们也和一般市民一样，深受封建思想和宗教迷信的影响，这就给他们整个的文学活动带来进步的不彻底性。冯梦龙的《三言》（进而影响到根据《三言》来表演的说书），就既有《杜十娘》、《沈小霞》那样富于反抗性的好作品，也有《三孝廉》、《庄子休》那样宣扬忠孝节义、虚无迷信的坏作品。

同统治阶级的占有、摧残、压制恰恰相反，农民和市民是热爱、保护、并创造着小说的。正如叶盛所说的：“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sup>①</sup>。”封建统治阶级通过他们的作者用大量封建落后的作品来占领文化阵地，市民也通过自己的创作、表演，或通过代表他们的进步作者的创造、编纂，产生了不少富有人民性的优秀作品，来体现他们的思想观点和要求。在说书和话本范围内，除了统治阶级的禁令之外，斗争一般是错综复杂的，在作者和艺人身上，也有两种思想的存在和斗争。斗争的结果，则是代表人民意愿的好作品，普遍流传，长久地发挥其教育鼓舞作用。而封建反动的坏作品，虽然数量更多，却相形见绌，有的已被淘汰。

这就是明代复杂的社会矛盾，对说书和话本的基本影响。我们在下文作介绍和评价时，就以这样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意义为主要的依据。

## 第二节 明代的说书

明代说书艺术也得到了一些发展，这主要地表现为在对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配合较过去时代更为直接。另外，说书的艺术

<sup>①</sup> 《水东日记》卷二十一。

水平,也有明显的提高。说书活动,在社会上更为普遍了。不过由于资料缺乏,我们仅能从某些不太完整的记载中,略窥一些面貌而已。兹将明代说书的各种情况,除前几章已经提到的不再重复外,分别概述如下:

## 一、说水浒

水浒故事,南宋即已流行于民间,惟当时都是独立的分散的短篇故事。到了元末明初,形成了长篇小说《水浒传》。大名士文征明辈,也“暇日喜听人说宋江”(见第五章第二节引);曾刻《水浒传》的剧作家汪道昆,也在家里招集宾朋,剧谈水浒故事(见第六章第五节引)。有明一代的文籍中,谈到听说《水浒》的颇不少,兹录三则于此。

近一名士听人说《水浒》,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①。

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学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②。

余听其(柳敬亭)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啾央,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声③。

## 二、统治阶级对平话的利用

明代的统治阶级,认识到说书艺术有相当大的宣传作用,他们没有把说书技艺看成纯粹是娱乐性质或调剂生活的玩艺,总是利用它来作反动宣传的工具。统治阶级利用说书艺术和话本小说来宣扬封建道德,从皇帝的禁令和某些专集的序跋中明显可见。如

①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

② 袁中郎《解脱集》卷二《听朱生说〈水浒传〉》诗。

③ 张岱《陶庵梦忆》卷五。

《大明律》“禁止搬做杂剧律令”条：

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象，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这个“律令”虽然针对戏曲，必然也适用于说书。此外，统治阶级分子还利用说书来进行个人的政治活动。相传为明嘉靖时武定侯郭勋所撰的《英烈传》，就是为了宣扬其五世祖郭英之功而作的。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四云：

元末僭窃虽多，独陈友谅兵力强大，与我师鄱阳湖之战，相持昼夜，势不两存矣。时郭英、子兴兄弟侍上侧，进火攻之策。友谅势迫，启窗视师。英望见异常，并弓射之，箭贯其颊及睛而死。至今人知友谅死于流矢。不知郭所发也。……英亦不大居功，故人不知也。独《忠烈传》中明载。

所云《忠烈传》，大概就是《英烈传》，郭英最大的功绩是射杀陈友谅，所谓“一箭胜百万兵甲”，事见《英烈传》第三十九回《陈友谅鄱阳大战》。但沈德符的《野获编》卷五却丑诋郭勋冒功袭爵：

初，(郭)勋以附会张永嘉议大礼，因相倚互为援，骤得上宠。谋进爵上公，乃出奇计，自撰开国通俗纪传名《英烈传》者，内称其始祖郭英战功几埒开平、中山。而鄱阳之战，陈友谅中流矢死，当时本不知何人，乃云郭英所射。会内官之职平话者，日唱演于上前，且谓此相传旧本。上因惜英功大赏薄，有意崇进之。

不管郭勋是否冒功邀宠，他利用平话，令内官“日唱演于上前”，蓄意宣扬其祖郭英的功业，以获得高官厚爵，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沈德符的记载可信，那末，明代宫廷中还有以平话为职的内官，这或许就和南宋承应宫廷的“说话人”一样。

此外，还有利用平话来夸耀自己的功绩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杂史类“平播始末”条云：

明万历间(1573—1620)，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郭子章巡抚贵州，与李化龙同讨平之。化龙时巡抚四川，进总督四川湖广贵州军务。事平，

化龙有《平播全书》之作。其后一二武弁，造作平话，以播事平全归化龙一人之功。子章不平，作《平播始末》二卷以辨其诬。

是腐朽的统治阶级又唆使他的武弁们，编造平话来表扬自己，作为争功的工具了。

### 三、揭露地主恶霸罪行的说书

明代的说书活动中，有一个通过说唱大胆揭露当地恶霸地主罪行的例子。这一件事情，还成为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对恶霸斗争——“民抄董其昌”的诱因之一。

董其昌是盘踞在江苏松江府的大地主大官僚。他以书画享盛名，为人却极其贪婪淫毒。他勾结魏忠贤<sup>①</sup>，鱼肉乡里，仗着自己的财势，操纵柴米市场，残酷地剥削农民和手工业纺织工人（当时松江府是棉纺织业中心），甚至驱使其爪牙陈明等随意“拘责监候平民”。松江、青浦、上海一带人民对他积恨已深。

董其昌六十二岁时，看中了陆兆芳家的使女绿英，其次子祖常就带了二百多人到陆家把绿英抢走，给董作妾。这件事发生后，就有人创作了《黑白传》、《五精八魂记》等小说讽刺董其昌。所谓《黑白传》，是因为陆兆芳脸黑，而董其昌则号思白。《黑白传》第一回的标目是《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董居住在龙门寺）。此书诙谐点缀，颇堪捧腹，一时哄传<sup>②</sup>。说书人钱二更到处说唱这件新闻。董其昌听说以后，老羞成怒，恨之入骨，就把钱二及一个听客范泉（字廷芝）擒捉锁打（董认为《黑白传》即范所写），以致范气愤而死。范母带其儿媳、孙媳到董家说理，又遭董氏父子百般凌辱。因此群情愤激。《民抄董宦事实》载：

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竞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

① 见华亭章有谟《景船斋杂记》。

② 据曹家驹《说梦》卷二。

之谣。至于刊刻大书“兽宦董其昌”，“泉孽董祖常”等揭纸，沿街塞路，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亦共有冤揭粘贴，娼妓龟子游船等项，亦各有报纸相传，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矣。

至三月十五日府县官员“行香”之期，群众成千上万涌到明伦堂及董宅周围，骂不绝口。董氏父子亦雇打手一二百人，飞砖泼粪，与群众对打。次日，上海、青浦、金山等地百姓闻风赶来支援，把数百间画栋雕梁的罪恶兽舍，一炬而尽。董其昌全家逃走。于是这场轰轰烈烈的争斗，以百姓取得胜利，地主豪强遭到失败而告终<sup>①</sup>。

在这次斗争中，市民群众的首领之一金留，还“当众夸许，自谓葛成。”（葛成即苏州府织工暴动领袖葛贤）可见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说书活动能直接把矛头指向当地恶霸，显然和当时群众的觉悟分不开。

#### 四、农民起义军中的说书

明末，农民革命领袖张献忠尝命说书人讲说《三国》、《水浒》等来教育他部下的将士。刘銮《五石瓠》卷五云：

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其老本营筦队杨兴吾语孔尚大如此。

这支农民革命队伍，通过说书人的讲说，吸取了《三国》、《水浒》中许多战略战术，获得丰富的军事知识。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利用说书人在军中生动地给部队进行思想教育，激励士气，使他们在革命运动中作出巨大的贡献。

清陈康祺《燕下乡脞录》云：

明末，李定国初与孙可望并为贼，蜀人金公趾在军中，为说《三国演

<sup>①</sup> 按：民抄董宅事件，详载《民抄董宦事实》、《说梦》、《定陵纪略》等书。《民抄董宦事实》一书，有传抄本，昆山赵氏《又满楼丛书》本，神州国光社《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本。《定陵纪略》为长洲文秉荪符著，有《董氏焚劫始末》一文。本节所叙，多采自治秋的《民抄董其昌一案述略》一文，载1964年6月2日《人民日报》。

义》，每斥可望为董卓、曹操，而期定国以诸葛。定国大感曰：“孔明不敢望，关、张、伯约，不敢不勉。”自是遂与可望左。及受明桂王封爵，自誓努力报国、洗去贼名，百折不回、殉身缅甸，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则亦传习郢书之效矣。（清徐鼐《小腆纪年》所载相同）

这段记载虽然是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的，但也可看出，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李定国是以民族为重，不计前仇的英雄。在此基础上，说书人也可以起一定的鼓励作用。后来李定国于永历六年（1651）与桂王合力抗清，被封为南宁王，在西南各地积极展开抗清斗争，南明形势，一度为之好转。及至桂王被汉奸吴三桂杀死于昆明，李定国愤恨呕血而死。临死，告诫他的儿子及部下说：“宁死荒徼，不可投降。”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是为刘备统治集团，李定国的“死而后已”却的确是民族，表现出革命英雄李定国的高贵品质。

## 五、相国寺说书

相国寺规模宏大，宋元以来，一向为汴梁万姓交易和游乐的中心地。说书亦为其中重要伎艺表演之一，明代讲史的具体纪录甚少，《说岳全传》第十回《大相国寺闲听评话》，虽然讲的是南宋史事，可以说是明人讲史仅见的资料。

却说牛皋跟了那两个人，走进围场里来，举眼看时，却是一个说评话的，摆着一个书场，聚了许多人坐在那里听他说评话。那先生看见三个人进来，慌忙立起身来说道：“三位相公请坐。”那两个人也不谦逊，竟朝上坐下。牛皋也就在肩下坐定，听他说评话。却说的《北宋金枪倒马传》的故事，正说道：“太宗皇帝驾到五台山进香，被潘仁美引诱，观看透灵牌，照见塞北幽州天庆梁王的萧太后娘娘的梳妆楼，但见楼上放出五色毫光，太宗说：‘朕要去看看那梳妆楼，不知可去得否？’潘仁美奏道：‘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何况幽州？可令潘龙赉旨，去叫萧邦暂且搬移出去，待主公去看便了。’当下闪出那开宋金刀老令公杨业，出班奏道：‘去不得！陛下乃万乘之尊，岂可轻入虎狼之域？倘有疏虞，干系不小。’太宗

道：‘朕取太原，辽人心胆已寒，谅不妨事。’潘仁美乘势奏道：‘杨业擅阻圣驾，应将他父子监禁，待等回来议罪。’太宗准奏，即将杨家父子拘禁；传旨着潘龙来到萧邦，天庆梁王接旨，就与军师撒里马达计议，撒里马达奏道：‘狼主可将机就计，调齐七十二岛人马凑成百万，四面埋伏，待着宋太宗来时，将幽州围困，不怕南朝天子不是狼主的！’梁王大喜，依计而行，款潘龙，搬移出去，恭迎天驾往临。潘龙复旨，太宗同了一众大臣离了五台山，来到幽州。梁氏接驾进城，尚未坐定，一声炮响，伏兵齐起，将幽州城围得水泄不通。幸亏得八百里净山王呼必显藏旨出来，会见天庆梁王，只说回京取玉玺来献，把中原让你，方能骗出重围，来到雄州，召杨令公父子九人，领兵来到幽州解围。此叫作‘八虎闯幽州，杨家将的故事’。”说到这里，就不说了。那穿白的即身边取出银包，打开来将两锭银子，递与说书的道：“道友，我们是过路的，送轻莫怪。”那说书的道：“多谢相公们。”二人转身就走，牛皋也跟了出来。那说书的只认是三个同来的，那晓得是听白书的，牛皋心里还想：“这厮不知捣他娘甚么鬼？还送他两锭银子！”那穿红的道：“大哥方才这两锭银子，在大哥也不为多，只是这里本京人看了，只说大哥是乡下人。”那穿白的道：“兄弟，你不曾听见说，我的先祖父子九人，这个七祖宗，百万军中没有敌手。莫说两锭，十锭也值。”穿红的道：“原来如此。”牛皋暗想：“原来为祖宗之事，倘然说着我的祖宗，拿什么与他？”又见那穿白的道：“大哥，这一堆去看看。”穿红的道：“小弟当得奉陪。”两个走进人丛里，穿白的叫了一声：“列位，我们是远方来的，让一让。”众人听见，闪开一条路，让他两个进去。那牛皋仍旧跟了进来，看是做什么的，原来与对门一样说书的。这道友见他三个进来，也叫声：“请坐。”那三个坐定，听他说的是《兴唐传》。正说道：“秦王李世民在枷锁山赴五龙会，内有一员大将，天下数他是第七条好汉，姓罗名成；奉军师将令，独自一人，拿洛阳王王世充、楚州南阳王朱仙灿、湘州白御王高谈圣、明州夏明王窦建德、曹州宋义王孟海公……”正说到“罗成独要成功，把住山口……”说到此处，就住了。这穿红的也向身边拿出四锭银子来，叫道：“朋友，我们是过路的，不曾多带得，莫要嫌怪。”说书的连称“多谢”。三个人出来，牛皋想道：“又是他祖宗了！”

明无名氏的《如梦录》是专叙明代汴梁风俗景物的书，其中也提到相国寺说书：

(正月)自初一日后,赴相国寺萧墙街,听谈古说因果,游乐。(《节令礼仪记》)

相国寺每日寺中有说书、算卦、相面,百艺逞能,亦有卖吃食等项。(《街市纪》)

“谈古”,大概是指讲史,“说因果”,可能是“说经”或“弹唱因缘”之类,惜所记过简,无从得其梗概。

## 六、盲艺人及其他

盲艺人的弹唱,历史相当久远。有文献可征的,恐怕要以陆放翁诗提到的盲翁说蔡中郎故事为最早。明代承宋元遗风,说书情况自不会有多大变动。但在许多文献中,有关说书资料,却极少见。偶尔涉及的,也只是一些盲艺人的活动,他们都是走街坊的说唱者,没有固定的表演场所和时间。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里已载着杭州男女瞽者说唱情况(已见第六章第六节引)。姜南《芙塘诗话》卷二《洗砚新录·演小说》条也说:

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学弹琵琶,演古今小说,以觅衣食。北方最多,京师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

又田艺蘅《留青日札》记杭州盲女说:

曰瞎先生者,乃双目瞽女,即宋陌头盲女之流。自幼学习小说、词曲,弹琵琶为生。多有美色,精伎艺,善笑谑,可动人者。大家妇女,骄奢之极,无以度日,必招致此辈,养之深院静室,昼夜狎集饮宴,称之曰先生。如杭之陆先生、高先生、周先生之类。

盲女不仅说唱古今小说、平话,也说唱弹词。臧懋循《负苞堂文集》卷三《弹词小纪》云:

若有弹词,多瞽者以小鼓、拍板、说唱于九衢三市,亦有妇人以被弦索,盖变之最下者也。

沈德符《野获编》卷十八《冤狱》条云:

其魁名朱国臣者,初亦宰夫也,蓄二瞽姬,教以弹词,博金钱,夜则侍酒。